

古代有消防队吗?他们是如何灭火的?

全国消防日刚刚过去不久。经过多年的宣传,人们消防意识有了极大提升。虽然现在的灭火设备越来越先进,但如今火灾扑救的难度和可能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大,火灾依然对人民生命财产构成巨大威胁。

比起现代消防,古人的消防设备要落后许多,但或者正因如此,古人的消防意识非常强。早在商周时期,就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消防理论,提出对付火灾要“防患于未然”。

东汉荀悦在《申鉴·杂言》中说:“一曰防,二曰救,三曰戒。先其未然谓之防,发而止之谓之救,行而责之谓之戒。防为上,救次之,戒为下。”

本文以通州为例。作为京杭大运河北端码头和重要仓储地的通州,对消防一直特别重视。通州文史专家王文续、张来源、陈乃文等老先生(均已离世)都曾对民国时期通州的消防做过陈述或记录,通过他们的记录,得以了解当年通州城的消防细节。

“救火机”是水会的主要装备

王文续老先生写的《通州水会》一文,详细介绍过通州“水会”在消防中的作用。他介绍,当时的通州水会一般设在东关、北关的寺庙里边,最早的是东关慕义水会和北关的坎善水会。这两个地址方位都是漕运码头附近,可见当时通州消防的对象主要是漕运码头。后来北街又开办了永善水会等其他水会,这些水会服务的就是一般的老百姓了。

再以后又在通州新城开办同善水会和济善水会,后合并为济善水会,还在东大街开办义善水会和鼓楼前的助水会等。至此通州开办的水会同时达四五家,分布在通州城厢各处,每遇火警,各水会争先出动救援,久而久之还形成了一整套规矩,各水会严格按照约定规矩行事,保障了通州城及临近乡村的消防安全。

当时通州水会的消防设备都有什么呢?上面的几位老先生都曾说过,救火的主要工具叫“唧筒”。

王文续老先生曾对它有形象的描述:“唧筒”又叫

“救火机”,它有两个大水箱,每个水箱里安有一个活塞(类似气筒的原理),左右两个活塞的连杆都接在一根大杠上,大杠安在两个水箱中间支柱的顶端,水箱装满水以后,几个彪形大汉用力压大杠,两个水箱的活塞一上一下产生强大压力,让水经过水枪的细小龙头喷出,水流承受的压力越大,水柱喷得越高、越远,灭火的力量也就越大。所以领嘴子的人要用力堵住龙头,以便增大压力,让水喷得更远。

其实,“唧筒”古已有之,它也是古人们灭火用的工具,那么古代文献中记载的“唧筒”是什么样呢?北宋曾公亮的《武经总要》里就有“唧筒”的插图,它跟现在有的地方还在用的小型喷雾“搋子”的结构差不多,采用气筒打气原理,只是个头要比喷雾的“搋子”大得多。曾公亮在《武经总要前集》(卷十二)对“唧筒”的用法有介绍:“筒用长竹,下开窍,以絮裹(活塞)水杆,自窍唧水……”唧筒中装有活塞和拉杆,用时将竹筒没入水中,然后把絮裹(活塞)水杆(拉杆)向上抽起,水便通过窍(阀)进入其中,再压下套筒,筒中的水便可以喷射出去,这像极了今天孩子们玩的水枪。据说后来不断改进的唧筒装置,喷出的水射程能达20米。宋代以降到清末,它就是中国消防的主要器具。

不过,对比王文续老先生描述的“救火机”,显然已不能算是宋代的“唧筒”了,它很有可能是清末从西方引进的先进消防工具“水龙”,只不过有些部件因陋就简,用竹筒来代替。而且王文续先生在《通州水会》中记载,通州各水会的“救火机”数量不同,大小型号也不一样。当时东关慕义水会有一台最为讲究,它是从北京城里一个落魄宦官手中买到,这台“救火机”用云南白铜制成,上面镶嵌二龙戏珠和若干条蟠龙,富丽堂皇,精巧绝伦。根据这个描述,笔者更加觉得它就是清末引进的“水龙”。

通州鼓楼是“望火楼”

根据多位老先生的描述,通州的鼓楼,在消防中有着特殊的地位。当年,通州的各水会,公推同善水会在通州的制高点——鼓



通州南大街旧照,远处为鼓楼,它也是通州的“望火楼”。



北宋《武经总要》里的消防器械

楼上义务值班,进行火情瞭望,鼓楼也就是通州消防的“望火楼”。清末民初时鼓楼在通州城位置居中,又是较高建筑,用作望火楼再合适不过。无论哪里发现了火情,都是先通知到鼓楼,以鼓楼为定点,用鼓声通报火情发生方位,一般是“南前、北后、左东、右西”。一旦发生火情,通过“前三、后四、左五、右六”等敲鼓的点数指定火情方位。

虽然通州各水会有各自负责的救火范围,但发生火情后,水会不分你我,都要出动救火。各水会听到警报后,立即鸣锣集合队伍,这叫“接锣”。不论白天或黑夜,水会的成员听到锣声,无特殊事必须马上到,无故不到者要接受处罚。成员按照各人所司的职务,随队奔赴火场,这叫“出会”。首先到达火场的水会“会头”,就是这次救灾现场的总指挥。他选好基地,白天以督旗为号令,夜间以督灯为号令,指挥水会救火。第二个到达现场的水会,必须与先到的水会“会头”联系,听从其调度指挥。

当时救火的主要设备是“救火机”,救火时的辅助器具可谓五花八门,比如大锣、小锣、大钩竿(火钩)、镐子、铁锹、冰镩、柳罐等等,不一而足。它们各有各的用处,比如钩竿用来扒开失火的房舍,还要在火场边缘扒出断火道,以防火势蔓延;铁锹用来铲沙土压火;柳罐、水桶用来担水……

别看水会是民间性质,各水会约定的救火规矩却非常严格,从组织上说,一般的会设会头一人(后改称主任),会头的产生有的是由几个大商号轮流值年,有的是由水会的成员推选,有的则是当地豪绅垄断。

会头是一个水会的总负责人,其下还有副主任二三人,协助会头管理水会事宜。水会还设督管若干人,分管各职,司账一人,还有“文善”“武善”和“助善”等。“文善”,出会时佩戴黄色袖章,有的手执蓝色小旗,负责维持秩序,或负责稽查,还有的干些敲锣、提灯、挑圆箩等活;“武善”出会时身穿坎肩,

负责抬“救火机”,并负责扒房救火或扒拆火道、抢救人员等重活;“助善”每次出会用自备的手推车和油布制的水桶,供各水会用水。

火势扑灭以后,撤离火场叫“回会”。他们必须按照水会距离火场路途远近,由总指挥调度,远者先退,近者后退,谓之“让会”。每个水会“回会”前,先集合队伍,检点人员和器材,然后敲锣三响,高举大纛(dào)旗督队,秩序井然地离开火场。但是离火场最近的水会,还要留下几个人看守火场,防止其死灰复燃,叫作“波落”。

陈乃文老先生曾讲述过民国时期通州名人王芝祥的故事,王芝祥当年主持倡建了通州“新城水会”,人员精干设备精良。当时拥有新式压水车3辆,长水龙袋十数条,水枪十余把,挠钩、大斧、水桶、长绳各若干,大铜锣两面,还有前写“新城”后写“水”字的黑色号坎数十件。新城水会成立较晚,但消防业绩也相当显著,不少商铺甚至包括民国初年正月灯节,通州旧城的一些建筑着火,都多亏了新城水会及时出会,才没有造成更大的火灾损失。

粮仓建有若干水道

在几千年的历史中,古人为防火,衍生出了深厚的防火文化,特别是古代建筑中,对防火有诸多体现。比如,古代重要建筑的屋顶内都有藻井,它多为水藻图案,藻类是水生植物,五行中水克火;屋的外顶则常用黑瓦,也因五行中水为黑色;置于屋正脊两端的鸱吻兽,也有祈雨避火之意,有的脊两端雕刻了很多水里的或

不怕水的动物,也是为了防火;很多建筑门上的匾额,写字都讲究“门不带钩”,什么意思?就是“门”字那一竖不带“钩”,要避“火钩”之嫌。

通州作为漕运码头仓储重地,在建筑结构上会采取哪些消防措施呢?通州文史专家周良先生,生前曾考证过通州粮仓遗迹,他对其防火结构有过描述。通州中仓,粮仓五间为一廒,几座相连的廒叫“连”,连与连相距三丈,左右之间还有通道,就叫“水道”。水道宽二丈,直通仓沟,仓沟再与河道相连,构成一个消防用水的网络。

仓沟既是护粮仓的壕堑,又是排水系统,还是消防水源。明清时这条水沟很大,南头有一处水塘,北头则接通惠河的一条支流,这条水沟的东岸就是中仓,中仓内用以消防的水道都与其相连。清末,北运河停漕后,中仓废弃不用,仓沟也被废弃,后来成为一条街道,它就是如今通州人熟知的新建街。

当年,中仓的这些设计无疑就是为了消防,道理和用街巷分隔民居一样。在离水道稍远的粮仓近处,也会增设水井,粮仓重地当然会配备较先进的消防设备。除此之外,按照传统文化习俗,中仓南门处还建一座火神庙,用于祈求上天保佑不受火灾。

通州除中仓还有东仓、西仓及后来的新城南仓、后南仓等,每个粮仓的布局都考虑到了消防,粮仓也驻守了很多兵丁,其中有专业“救火兵丁”,他们更不敢稍有懈怠。

通州是漕运的中转站,那么如果漕运粮船在运河上遇到火灾怎么办?那时候除了漕船自备的消防设备,各大船帮还配有专门的灭火船,灭火船所用的消防器材与陆地差别不大,但船在水上,灭火的水源充分。当年通州是京杭大运河北端漕运码头,这里水面上漕船密集,用于消防的灭火船也多,一旦漕船发生火灾,各船帮的灭火船也会协同作战。

1949年以后,中国的消防事业逐步完善,特别是现代化的消防器械取代了笨重的“救火机”,通州水会也完成了历史使命。

(据《北京晚报》)